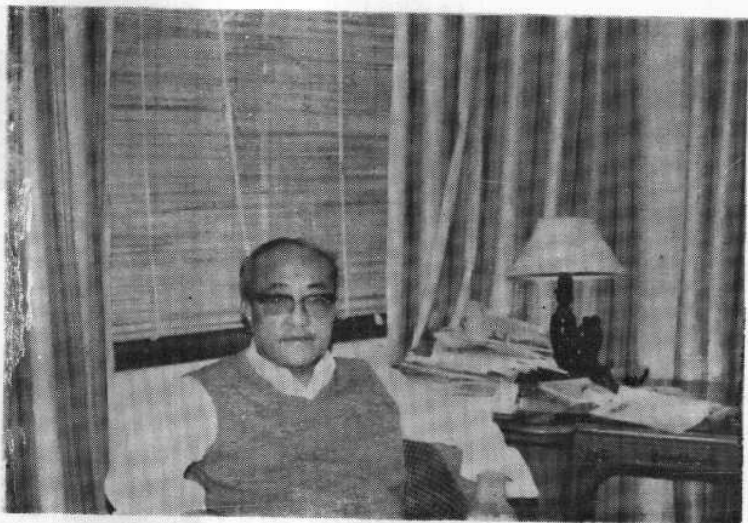




苦堂

張平書

目 录

“牛棚”与牛	1
“作家”的进化	5
文学家与数学家	8
“这也是生活”	11
妓院里的爱情	14
鬼恋	19
手掌	23
好快刀	26
“文责自负”	29
如梦记	32
打差别	39
戏法	42
月下老人的诗签	45
长官意志	48
诽谤	52
诚则灵	55
我的端砚	59

油焖笋	63
音容宛在	66
“德寿宫中写洛神”	70
杂文与骂人	74
哈哈镜	78
雄谈	81
“是吗?”	84
“算了!”	88
相骂	92
照相	97
做文章	100
“危险的行业”	104
戌年谈狗	107
“雅贼”	112
升级与降级	116
“基本属实”	119
治僵化法	123
从“老鼠”想到“弄权”	126
不倒翁	129
毛笔	132
帮倒忙	137
《写在舞台边上》序	140
配套	144
报春	147

天一阁墨	151
“津门旧事”	153
“书简文学”	156
也谈“知足常乐”	160
〔附录〕 四乐颂	冯英子 163
知识的价值	166
论“海派”	170
节奏	175
分寸	180
小辫子	183
格言、成语及其他	186
神与人	192
家谱	195
再论“海派”	197
怀油条	200

“牛棚”与牛

十二年前，不知怎样一来，许多人一下子都住在“牛棚”里了（这也是一个“今典”，应该加以适当的注释，并收入大百科全书，不然过了多少年，人们将不能了解其明确的涵义，会引起一番学术上的争论也说不定的。）当时棒彪和“四人帮”一伙，为了搞掉一大批对他们的“事业”有妨碍或损害的人，就采取了断然措施。第一步，先统统称之为“牛鬼蛇神”把他们关在“牛棚”里。所谓“牛棚”其实也并非真的老牛的宿舍，而是随便一个什么所在，只要能把人关在里面就好。自然并非什么好去处，是在某一机关、学校……所能找到的最坏的角落，其意不只是为了让人们吃苦，更重要的还在表明，谁住在这样的地方，就简直已经不算人，与畜生无异了。

这自然只是第一步，住在“牛棚”里的人，还是“妾身未分明”的，要等“帽子公司”加工赶制出各式帽子以后，然后再一个个地安排。自然也有跳

出“牛棚”，阔了起来的人物，但交上这种“好运”的毕竟是极少的。

我有两位朋友，当时就一起关在一处“牛棚”里。“牛棚”隔壁，是一个大房间，是好几个“造反司令部”的驻所。一天，司令部要扩充地盘了，就将这些“牛”赶到更阴暗的地方去。一位朋友有感于此，悄悄对身边的难友说，“这真算得是‘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了。”一时传为“牛棚佳话”。

我很想对“牛鬼蛇神”这个词语作些小小的考证，可惜学殖荒落，手边无书，说不出什么精辟的看法。首先，我就说不出它的最早的出处，只记得杜牧在给李长吉的诗歌作序时，曾经说过，“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又过了七八百年，明代的王思任又说过，“贺既吐空一世，世亦以贺为蛇魅牛妖。”看来，杜牧之和王思任都并非想说李贺的坏话，倒是指出他的特色，加以表彰的。特别是王思任，他把牛鬼蛇神简化为蛇、牛，是很有见地的。“鬼神之事，难言之矣”，还是不提为好，牛和蛇则是确凿的客观存在，不妨称引。

中国的先民，对牛是很有感情的。它很早就出现于诗歌，绘画……一般都加以同情，感谢赞誉。这是很公正的。牛对人类的贡献是不论怎样

昧了良心，也不忍抹杀的。古代的圣人，心里想吃牛肉，却不忍看到牛被宰杀以前的觳觫之状，要离开厨房远远的，就说明着这种良心发现的情景。牛什么时候开始有些神化，我也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也不曾阔气得象印度的神牛一般，则是无疑的。牛头马面，是城隍老爷手下的狗腿子，这只能算是对牛马的侮辱，而且也是外来的思想材料，并非中国人民的意见。

我曾藏有一册明代嘉靖刻本的《徐庆录》，还是天一阁的旧物。是当时的大官、浙江巡抚徐栻刻梓的。我怀疑这是一种带有官方宣传品性质的东西，它收有《劝人勿食牛肉文》，和许多《食牛果报故事》，徐栻的刊书识语更有“余叨抚两浙，遵例禁宰耕牛……”的话。他是用“神道设教”的方法，帮助政策的推行的。这本小册子很可以说明牛是农民的宝贝这个真理。

文艺家对牛也有很好的感情，唐代的韩滉就是画牛专家，他的《五牛图》真迹还藏在故宫博物院。沈石田也喜欢画水牛，连和尚也用水牛和它鼻子上的牛绳来说明哲理。诗人笔下的牛就更数不清，清皇族敦诚在哀悼他的好友、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诗里也有“牛鬼遗文悲李贺”的句子，一直到鲁迅先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总之，我想来想去，似乎没有谁讲过牛的坏话。

至于蛇，自然有些神秘。好象在很古的时候，就已经是神物了。传说中的女娲，就是人首蛇身的，至今我们还能从秦汉以来的绘画、石刻……上看到那形象。这是民俗学家的专业，我毫无插嘴的资格。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蛇也并非什么坏东西。杨椒山吃蚺蛇胆，是为了和严嵩斗争；至今广东菜里还是把蛇制品算做十分名贵的事物……

可是这许多，在“四人帮”看来，简直都不算一回事。江青把孙中山先生也叫作牛鬼蛇神，就说明了一切。他们除去干了无数坏事，难道还有某些起码的常识吗？

一九七八，九，二十五

“作家”的进化

有这样一个故事，听来的然而真实的。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上海某机构有一位“作家”，“业余”创作了一部小说。题材、人物、情节……统统是最时髦的，合于江氏创作法典的。“作家”的气派也着实不小，边写边发排，写得起劲，排得紧张。可惜不曾等到完工，“四人帮”就覆灭了。“作家”不肯使“杰作”夭折，更起劲地赶写，工人排得却有些有气无力起来。又过了好一阵，“作家”仍无歇手之意，工人干脆罢了他的工，因为实在忍无可忍了。

工人还贴了这位“作家”的大字报，指出他的小说，在政治上反动透顶，在艺术上无比拙劣。“作家”不服气，答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的小说，只要稍加修改，还是可以用的嘛！”

这故事是万分离奇的，但又是万分真实的。我觉得很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这位“作家”运用的创作原则和方法，不必说

社会主义的，就连古本的《文学概论》里也找不见，倒确实是江青的衣钵真传。他的工作方法也有些“现代化”。那小说是说在一个小火车站上，有一个“走资派”的老站长，有一个“造反派”的小青年，经过一场人尽可猜的“战斗”，“走资派”垮台，“造反派”胜利，于是就完成了表现当前最、最、最……重大主题的任务。这一切都是有大量的预制构件的，从情节、人物、语言，到环境描写……无不齐备。只要换几个人名，调一个地点，另一部“崭新的”作品就出现了。人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作家这一行当的进化，已经从手工业跃进了现代化大生产之门。什么立场、感情、技巧……都变成了过时的，应予淘汰的该死的东西。只要老板一声令下，伙计一揿电钮，在川流不息的流水线上就会生产出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来。真是岂不快哉！

同时，还可以保证这许多都是“一级品”，绝没有“次货”，完全不必担心会出现“离经叛道”的东西。

谁说江青没有发明创造呢？这就是一宗。这真不愧为开了新纪元，改变了生产关系的大变革。难怪张春桥要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要以江青为开山祖师；《国际歌》以来一百多年的空白也要由江青来填补了。看来，诺贝尔文学奖金还嫌不够，

远不足以表彰女皇的丰功伟绩……

这样分析了一通之后，我似乎有些理解了那位“作家”的愤愤不平的心。看来，他是把伟大的人民和他的老板弄得有些混淆了。他深信，老板换了人，伙计却不该失业。定货的规格可以不同，那套“现代化”的“流水线”却万无拆毁之理。有奶便是娘，主人手指之处，叭儿狗就保证一路吠过去。这是万古不变的“真理”，可惜现在人们居然有些不肯承认了。

这位“作家”一定又同时坚信，文学艺术已经不再是“上层建筑”，变成某种没有阶级性的东西了。作家也奉还了“灵魂工程师”的桂冠，成了没有灵魂的活工具。

这个故事所提供的值得深思的问题还有许多，不过，暂时先简单地讲这一点，以备撰写《四人帮时代的文学》者的参考。

一九七八，九，二十八

文学家与数学家

李商隐的《锦瑟》诗，一千一百年来经无数人猜详、解释，但终于没有谁能做出为大家所信服的解释。元好问叹道：“一篇锦瑟解人难”；又说：“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尽爱西崑好，只恨无人作郑笺。”看起来，想完美地解释《锦瑟》诗，除了起商隐于九原，怕是无能为力了。不过这也不要紧。一位诗人，当他进行创作时，是一定有所依据的。或是某事，或是某情（情感也是由事引起的）。但当作品诞生以后，往往就会脱离了原来的基础而独立存在。正如曹雪芹写《红楼梦》，贾宝玉与林黛玉，都是有真实的人物作模特儿的（也可能不只是某一人，而是集合了一个以上的人物的特点）。但作品一出世，正如脱离了母腹的婴儿，有了自己的生命，不知道原来的母体也毫无妨碍了。

因此不能得到满意的解释（这往往是近于索隐或黑幕揭露之类的性质的）也不要紧。我们还是

可以欣赏那作品。

不过这道理对有些人是说不通的。他们非得费尽力气，找出它的“真意”才罢。有人说这是为令狐家的青衣而作的；有人说这是追悼亡妻之作。有些象，但又不很象。

真是所谓见仁见智，众说纷纭。此外还有别的不少说法。大别之，大约有两类：有人说这是为女人而作的，有人说这是一首政治诗。

我是比较倾向于前说的，那证据是结末两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情”，我看只有当对方是女性时，才有可能，姑不论是妻子还是恋人。虽然自“楚骚”以来，诗中有“美人香草”的一种传统，但我无论如何不能将李义山想象成为那样的“风流人物”，一定要将自己或旁人比为妾妇和外宅，他还不至于此。

当然，这样简单的道理对“四人帮”的论客是毫无作用的。

“贤”如梁效，也没有敢在一篇大讲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论文”里论及《锦瑟》，可见这个截搭题委实不大好作。然而，不要紧。这个缺陷总是会有人加以弥补的。一位以研究中国文学发展著名的教授，经过“研究”，终于“创造”了“奇迹”了。他说，李商隐的《锦瑟》诗是对王叔文革新派的失败表示同情而作。不过很谦虚，仅仅称之为“个人

的设想”，“学者”的风度还是不差的。

教授的理由是，《锦瑟》作于作者晚年，约在太和九年左右（这个假定教授并不曾提出任何论证）。上距王叔文等的垮台，正好五十年光景。这是唯一“有力”的理由。此外就不过是胡扯，连教授自己也说，“可能有牵强附会之病”了。

这种“研究”方法真不能不使人叹为观止。

我又想起近五十年前，这位教授曾经乱点古书，出了破句。原因是把“古风”当做一律五字或七字句。这错误经鲁迅先生指出，并劝告教授，不要把标点古书看得太方便了。只是这样扳着指头断句，那就不用着文学家，只要数学家也行。时间过去了五十年，看来教授的本领并无什么长进，也还是扳指头。这回是扳了五十次，就扳出了最新“科研成果”。

那动机，则是想把李商隐拉入“法家”阵营，不能不挖空心思找出两条“硬证”，真是用心良苦。

要知道“四人帮”横行时斯文扫地的真相的么？这才是好例。切勿错误地在受尽侮辱、折磨的知识分子当中去寻找为要。

一九七八，十，三

“这也是生活”

参观了一次“中国古代文具展览会”，引起了一些感想，顺便在这里说一说，同时借用了一个鲁迅先生曾经使用过的题目。

“文具”是现代的词汇，它的前身就是所谓“文房四宝”。但如果迳直称之为《文房四宝展览》那是不大妥当的，不免有些过于陈旧了。但这里所谓“宝”，其实不过是为了表达重视、爱护之意而已。科学家重视精密仪器，如果称之为“科研之宝”，那就不会引起什么误会。

话虽如此，在这个展览中，我却确实发现了不少“宝物”。那制作之精妙，质量之超特，有些确不愧称之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不论是笔工、墨工，还是制纸雕砚的工匠，毫无例外都是劳动者。皇帝老倌或贵官、名士是不会亲自动手制造这些事物的。他们只是享用（不过有时他们要参加一些设计意见的）。这些“文具”，又有许多是过去被称为“小摆设”的，就是地主们酒足饭饱以后想出

来用以消遣的东西，或称之“文玩”。

老话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或更为直捷地提出“饮食男女”来，这都讲的是一个意思。一切文化，都是社会生产发达以后的产物，恐怕这条意见是不必担心任何时代的实践检验的。问题的实质仅在于，过去是多数人在辛勤劳作；而只有少数人在玩乐、享受。这种办法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行不通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总是向着大家都享受高度文化的方向前进。先要生存，再求温饱，然后就要求生活得有趣，丰富。今天世界上旅游事业的兴旺，就说明了这个道理。看世界今后发展的趋势，做工、务农的人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逐步降低之势。绝大多数人的出路在于服务性行业，那就是使大家都生活得更合理更舒服的行当。如此看来，对“小摆设”之类的看法，是应该采取更科学、更“向前看”的态度的。

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谈“癖”》的小文，主要是想说明，“爱好”对一个人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是必要的。在当时，这样的老生常谈，也会被人看作“奇谈怪论”的。虽然许多人心里也同样这样想，但嘴里却不肯说，还要装出有些不以为然的樣子，以示“高明”。“高明”也的确是“高明”的，有一些人总想维持“只许少数人玩，却禁止群众玩”的老章程。但又不便启齿，于是就想出了许